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南侧,耸立着一道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单墙。这道墙俗称“哭墙”,上面镌刻着10665个遇难者的姓名。

1995年初建时,“哭墙”长43米,刻有3000个遇难者的姓名,象征南京大屠杀30万遇难者。这些年历经数次增刻,墙体长度延长了近一倍。

“哭墙”,犹如南京大屠杀30万遇难者共同的墓碑;

10665个姓名,犹如他们共同的碑文——每个姓名都是历史的铁证。多年来,为找回更多遇难者的姓名,多方坚持不懈追寻,原南京炮兵学院退休教授费仲兴就是其中之一。

本文作者季压西与费仲兴曾同在原南京炮兵学院任教,彼此熟识。12月13日是第十二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季压西写下此文,介绍费仲兴调查搜集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单的故事。

每个姓名都是如山铁证

——原南京炮兵学院退休教授费仲兴调查搜集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单的故事

■季压西

仿佛天降大任落到肩上

在原南京炮兵学院任教时,我与费仲兴教授的专业不同,但都有历史研究这一业余爱好。他年长我13岁,我一直称呼他为“费老”。等我退休后与费老住到干休所同一栋楼里时,我才更多地了解到,费老退休后默默干着一件了不起的事——搜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单。

原南京炮兵学院坐落于南京东郊汤山一带,有着悠久的历史。记得还没退休时,费老对学校的历史颇感兴趣,除了泡在图书馆、档案馆查找资料外,他常在课后骑自行车探访周边村庄的老人,从他们口中了解学校当年的情况。

2001年5月的一天,费老来到一个村庄,碰上当时年近八旬的崔广荣老人。两人闲聊时,老人顺嘴说起,1937年冬南京城内发生大屠杀时,汤山一带的村庄也遭日军放火焚烧,还有村民惨遭杀害。

为了解那段历史,费老跑了好几家图书馆和档案馆,翻阅地方志等资料,但令他惊讶的是,均没有查到崔广荣老人讲的惨痛往事。他突然意识到,要想走近那段历史,只“钻”文献资料远远不够。当时,那段往事的不少见证者还在世。于是,费老揣着单位开的介绍信,走村串户寻找见证者,调查当年的真相,希望为那段历史补上空白。

“我对汤山的历史比较了解,还听得懂当地老人的方言。加上长住汤山,没有人比我更适合做这项调查。这项工作仿佛天降大任落到肩上,促使我把那段历史调查清楚,好给当年惨死在日军刀枪下的同胞一个交代。”费老这样对我说。

拿起来就放不下的使命

费老最初只计划对学校周边的村庄进行调查,谁知调查开始后一发不可收,范围最终辐射到汤山地区3个镇、90多个自然村。

每到一村庄,费老第一件事就是打听“村里还有哪些80岁上下的老人健在”。找到这些老人后,他总是急切地问:“您还记得当年的跑反吗?”

“跑反”一词,如今不为人所知,但当年日军侵占南京时,这个词不仅挂在人们嘴边,还令人闻之色变——它表示“躲避战祸、逃命避难”之义。有老人回忆,当年最怕听到的就是屋外有人喊:“小鬼子来啦!快跑呀!”

费老说,1937年天寒地冻中噩梦般的“跑反”经历,给老人们留下的印象太深,只要一提到这两个字,不少老人就会打开话匣子,跟他聊起来。他们中,有的曾目睹日军烧杀抢掠的血腥场面,有的在日军的刺刀下受了伤,有的痛失亲人。日军犯下的累累罪行,给许多老



人留下一生无法驱散的心理阴影。有的老人因当年受过枪声的刺激,再也听不得鞭炮声。有的老人当时虽然年幼,但从父母那里一遍又一遍听到那个冬天发生的惨剧,形成了抹不去的记忆。

费老退休前一边忙教学,一边挤时间做调查。2004年退休后,他便全身心投入调查中。只要天气允许,他就早早起床,吃过早饭便骑上自行车出发,直到中午才回家。下午,他又赶紧在电脑上把当日与老人们的谈话笔记整理出来。日复一日,费老严格按照这样的时间表,一丝不苟做着这项工作。对费老而言,这绝不是打发时间的业余爱好,而是一份拿起来就放不下的使命。

看到这位军校退休教授前来了解那段历史,曾有受访老人不解地问:“现在让我们讲这些事还有啥用?”费老真诚地说:“我要把你们当年吃的苦、受的难统统记下来,讲给我的学生听,讲给后代听。”

让冰冷的数字有了生命

翻看费老的几十本笔记,除了一段段或长或短的口述记录外,最显眼的是一组组人名。费老说:“要讲清楚一件事,就得弄清楚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这几个要素中,‘人物’是核心。”

在查实南京大屠杀汤山一带遇难者人名上,费老花的时间最多,也留下很多遗憾。他告诉我,毕竟多年过去,有些遇难者只留给后人诸如“小道士”“秦大饼”“陈疤痕”等绰号。有的遇难者只留下了家庭关系,如“苏小六子”“刘正六的三哥”“邓本兰的四叔”“王光宝的父亲”。更让人心绪难平的是,有的遇难者只留下了姓氏。无可奈何的费老只好在姓氏后面画两个圆圈,如“王○○”“杜○○”。

费老说,他记录下的姓名,哪怕已残缺不全,都曾是一个具体、鲜活的生

命,铭刻着那个惨痛年代的印记,是那段黑暗、恐怖历史的见证。2014年,在首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到来之际,费老满怀深情对采访他的记者说:“30万这个数字听起来是冰冷的,但当一个个遇难者的姓名、身份、遇难过程呈现在世人面前时,30万这个数字便有了生命,控诉着日寇惨无人道的暴行。”

调查搜集的过程中,费老如治学般严谨,每遇到一位能够提供有价值信息的受访老人,至少要与其交谈3次。他还会将整理好的材料逐字逐句念给老人听,直到确认无误为止。有时,为了确认一个重要案例或遇难者姓名,费老会找好几位老人独立叙述,相互印证。

有一年夏天,费老在庞家边村听90岁村民刘素珍提到,曾亲眼目睹鬼子在她家附近杀害了10多位“跑反”者。老人只记得遇难者遗体事后被草草埋在村东小塘边,局势渐稳后,从江苏句容来了人,伤心地把遗体挖出来,抬回家乡掩埋,但遇难者具体是哪个村庄的人,姓甚名谁,老人不记得了。

费老没有放过这条模糊的信息,花费大量时间,最终查找到这些遇难者来自句容下涧西村。该村老人的回忆,印证了刘素珍的口述,费老也由此得知其中8位遇难者的完整姓名:张余道、张长宝、张家林、张其余、李锦成、李锦培、袁炳生、王小宝。

费老感慨地对我说:“在我搜集整理的遇难者名单里,这8个名字的寻访经历最曲折,最艰辛,印象也最深刻。毫不夸张地说,要不是坚持不懈寻找,这些名字恐怕永远也找不到了。”

在多年的调查中,费老共寻访了350多位南京大屠杀历史见证者,用田野调查的方式为遇难者名单增添了834个名字。他的调查成果,受到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重视,搜集整理的口述材料被收入《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27卷和第39卷。



历史的镜子必将越擦越亮

调查搜集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单的过程中,费老承受的最大压力是“必须与时间赛跑”。用他的话说,自己行走在“历史的深巷”中,寻觅的人和事正快速消失在“深巷”尽头,一旦错过,就再也追不回来了。

诚如斯言。费老寻访过的老人,如今大多已不在人世。自2019年11月起,“哭墙”上的遇难者姓名一直停留在10665个,再也没有增添。每每想起自己寻访过的那些老人,想起那些被刻在“哭墙”上的名字,费老心中总有一种隐隐作痛的遗憾。他直言,比起30万这个数字,那道“哭墙”显得是那么单薄。

12月5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2025年新征文物史料发布会”,来自江苏徐州的高一学生于盼鹏捐赠了两份珍贵的文物史料。“这名15岁少年收集日军侵华铁证,用实际行动回击日本右翼势力歪曲历史的行径,彰显了新时代青年的家国情怀。”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在官网消息中写道。

伴随南京大屠杀见证者和幸存者渐渐离世,通过他们的口述来研究南京大屠杀的前路会越来越艰难。但我们相信,当越来越多的人如费老一样,致力于南京大屠杀还原史实拼图,历史的镜子必将越擦越亮。

图①:11月30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家庭祭告活动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遇难者名单墙前举行。

新华社发

图②:费仲兴前往周边村庄调查搜集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单。

作者供图

图③:季压西给南京当地小学生讲述费仲兴调查搜集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单的故事。

作者供图

制图:扈 硕

大家更好地掌握授课技巧,提高课堂管理能力。

具备扎实的专业技能,是退役军人追逐教师梦的第一步。如何帮助他们顺利走上“兵教师”岗位?在山东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支持下,济宁学院挂牌成立“山东省退役军人教育培训学院(济宁)”,与当地多所中小学及优质教育机构建立“订单式”合作关系,帮助学员在培训阶段清晰规划就业方向,促进优秀学员在结业前与心仪学校达成就业意向,待通过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后即可顺利“上岗”。

此外,山东省多在公开招聘中小学教师时设立退役军人专岗,有志于投身教育事业的优秀退役军人可以通过退役军人单列计划,经由考试走上教师岗位。

“我们还会进一步与济宁学院等单位合作,统筹优质资源,不断优化‘菜单’、统筹‘订单’,让更多‘迷彩园丁’走上讲台,在‘新战场’赢得新荣光。”山东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就业创业处相关负责人表示。



江苏省军区连云港离干部休养所荣誉室里,展示着一幅手绘的战例图,上方醒目地写着一行字——“奇袭白虎团战例要图”(上图)。它的绘制者,是该所已故老干部赵士君。

这幅战例要图的边角有些磨损,纸张也已泛黄。但它如同一扇门,带着参观者走进1953年夏季的那个雨夜。

1953年7月,抗美援朝战争的收官之战——金城战役打响。敌精锐部队之一的“白虎团”,如同挡在志愿军主攻方向的一颗“钉子”。善打硬仗的志愿军68军203师607团,奉命拔除这颗“钉子”。

研究作战方案时,时任607团政委苏克建议:在大部队发起总攻前,组建一个“化袭班”,伪装成敌人,捣毁“白虎团”指挥中心。建议被上级采纳后,苏克第一时间找到团侦察股长赵士君,商议“化袭班”人选。

侦察排官兵中,每个人的特点、脾气、拿手的侦察本领,赵士君了如指掌。经过慎重斟酌,他与苏克商定,由副排长杨育才带队,派出侦察排一班的10名战士,并挑选2名朝鲜族战士任联络员,组成“化袭班”。

“父亲曾说过,杨育才战地侦察经验丰富、胆大心细,所以让他带队。派一班战士集体参加,是因为他们天天在一起摸爬滚打,彼此间非常熟悉。选择两名朝鲜族战士,是为了能和敌人‘接上话’,更好地迷惑他们。”赵士君的儿子赵建辉回忆。

杨育才个头较高,化装后鼻梁更突出,便扮成美军顾问。联络员韩淡年扮成伪军小队队长,诈称护送美军顾问回后方。为确保出击行动一举成功,赵士君3次陪同苏克前往“化袭班”,了解官兵训练情况。官兵练得格外认真,从模拟排雷到用朝鲜语传递口令,再到遭遇敌人时的处置方法,每个环节都一丝不苟。赵士君还带领侦察排,多次深入前沿侦察,确定任务路线,并把绘制的袭击目标路线图,交给杨育才随身携带。

“化袭班”的13位勇士出发前,苏克、赵士君等来为他们送行。看着勇士们的身影渐渐消失,赵士君手中攥着备用路线图久久伫立。他的心,仿佛也与勇士们一同飞往那片危机四伏的战场。

战斗在1953年7月13日打响。“化袭班”的勇士们冒雨出击,勇猛作战,不负众望歼灭敌人,缴获“白虎团”团旗。

当捷报传来,赵士君的眼泪夺眶而出。事后,根据“化袭班”成员的回

抗美援朝老兵刘山水——

“把红色故事一直讲下去”

■卢枫明 林阳俊

“孩子们,我额头上的这道疤痕,就是当年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留下的。那年我21岁,担任连队通信员。有一次外出传递情报,一枚炮弹在我旁边爆炸,弹片击中我的头部和大腿……”

近日,在浙江省衢州市开化县林山乡的一户人家,身着老式军装的93岁抗美援朝老兵刘山水,面对一群前来听战斗故事的孩子,声情并茂讲述自己的战斗经历。当刘山水摘下军帽,展示额头上那道约5厘米长的伤疤时,孩子们纷纷睁大眼睛,好奇地凑近观看,眼神中满是敬佩。

走机关、串村社、进学校……自1992年退休以来,刘山水步履不停奔走在爱国主义教育宣讲的路上。“我是一名经历过战争考验的老兵,知道今天的美好生活来之不易。我们那个年代的老兵越来越少,我有责任把战斗故事讲下去,让后来人记住那段历史,更加热爱我们的党和国家。”刘山水说。

1932年,刘山水出生在开化县霞湖村。1953年,他和战友们跨过鸭绿江,奔赴抗美援朝战场,“2月入朝,3月就参加了战斗”。

因为能识文断字,战斗间隙刘山水经常帮战友们代写家书。在宣讲课堂上,刘山水一遍遍讲起当年往事:“一场战斗打响前,我帮四川籍战友张金礼写

好家书。他原本打算打完那一仗就寄出去,没想到在战斗中牺牲,那时他才19岁……”讲到动情处,刘山水声音哽咽,令听众深受感染。

除了抗美援朝战场上的战斗经历,开化县的红色历史,也是刘山水宣讲的重要内容。“开化县地处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方志敏、陈毅、粟裕等都在这里留下过战斗足迹。我从小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应该尽一点责任,让更多人了解这段红色历史。”刘山水说。

为积累更多的宣讲素材,多年来,刘山水多方查找史料,实地走访老战士,挖掘生动故事。同时,他保持着读书、看报、做笔记的习惯。刘山水卧室的书桌上,整齐摆放着笔记本和讲稿,重点内容都用红笔标注。

“父亲上了年纪,腰不太好,但他仍坚持伏案书写,有时写几行就得停下来,揉一揉腰再继续写。”刘山水的女儿刘美君说。

2022年,林山乡筹建“老兵宣讲团”,向当地17位军旅经历丰富的老兵发出邀请,刘山水是其中之一。尽管年事已高,刘山水依然毫不犹豫接受了邀请:“人多力量大,我们老兵组织起来讲红色故事,能产生更大的影响力。只要能讲,我就要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把红色故事一直讲下去!”